



圖一 西周 散盤 通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徑54.6公分 底徑41.4公分 重21312公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周：一場精密的地理履勘

在〈散盤〉的銘文裡，有兩個字格外引人注意。在第一、二行中，「涉」、「陟」（圖三）兩字相映成趣。「涉」寫成了兩個腳丫越過一條彎彎的河水；不一會兒，這跨越的足跡又登上了山巒頂峰，形成了「陟」。後者對今日的我們來說較為陌生，但對周人來說，卻是一個專門表現登上山崗崎嶇道路的字。一如《詩經·周南·卷耳》裡所吟頌的：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盃，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瘡矣，我仆痛矣，云何吁矣！

〈散盤〉所記這趟跋山涉水的旅程，起因於西周晚期（約西元前九世紀），位在周王畿西邊的散氏宗族受



圖三 〈散盤〉銘文中的「涉」、「陟」

到其北面鄰國——矢國——的攻擊。周王畿位於今日陝西省境內的渭河流域，分佈範圍約在西安市至岐山縣一帶，而散、矢則處於渭河與汧河的交會處，即今日陝西寶雞市附近。兩者均與周王室同為姬姓。但在〈散盤〉及一些其他青銅器銘文中，矢的領袖屢屢被稱之為矢王，或許表示了矢在當時已是一個自外於周的國家，與散有所不同。源於同一祖先的矢、散，似乎時而友好，時而反目。上海博物館藏的西周晚期〈散伯匜〉有銘：「散伯作矢姬寶匜」，意思是散伯做了這件青銅器給矢姬，表示彼此間還有著姻親關係。

〈散盤〉銘文顯示，這顯然沒有成功的武力侵犯，最後以矢國割地給散告終。於是，為劃定界線，雙方展開了一場精細的地理校勘。在某一個農曆九月，矢有十五人、散有十人參加了這次定界的履勘活動。其中包括了雙方的中央及地方官員。矢國的中央官員有鮮、且、微、武父、西工襄等人。割地的面積想必不小，因為矢國至少有三個邑（相當於今日

陟涉散盤

三千年的兩場校勘

吳曉筠



在本院三樓三〇五陳列室「吉金耀采——中國歷代銅器展」中，總是看到一群人圍著西周晚期〈散盤〉，屏氣凝神地聆聽導覽人員的解說。這件重量級文物，除了因體量甚巨、紋飾精美外，更因其上書有罕見的割地訂約過程，而為世所周知。本文將著重在〈散盤〉於西周鑄成的歷史原由，及其於清代重新出土後的流傳、考釋。在漫長的歷史時間中，周人對其所在世界的觀察與描述，成為後世學者努力追求上古聖賢價值的依憑。

西周晚期的〈散盤〉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最具代表性的典藏之一。（圖一）全器端凝厚重，加上長達三百五十字的銘文，向來被認為是


西周晚期青銅及書法藝術精粹。（圖二）但〈散盤〉向我們透露的古代訊息，卻遠比其藝術價值來得更加顯著。本文將藉由〈散盤〉的銘文及流

傳，展現兩種嚴謹的態度：一是地理空間上的，一是書籍紙本裡的。其中無法切割的對漢字的關注，則體現了華夏文明的核心價值。

的里)——豆、原、唯——的地方官員參加了定界。豆邑及原邑割讓出去的區域在地形上應是相當複雜，因為這兩個邑都出動了管理該邑周邊林地、水澤的官員「虞」。豆更派出了領有「小門人」官銜的官員，可能是管理豆邑大門的人員。散以其管理土地的「司土」和管理軍事及治安的「司馬」等中央官員，以及屬邑的地方官若干，一起進行會勘，以示慎重。

在雙方人員的見證下，校勘的旅程從瀋河開始。首先勘查的是要轉讓的隰田。渡過瀋河向南走，到了大湖邊上立下第一個疆界記號。再經過彎彎曲曲的路線，一下子到了柳樹邊，一下子又再渡過了瀋河，不一會兒又站上了丘陵；中間又經過了原邑、芻邑、周邑、菓邑，並在這些小邑的路邊樹立界標；最後來到了唯邑的墓地。這塊隰田地形複雜，包括了丘陵、湖泊及河流，途中至少立下了十三個新的疆界標記。接著履勘的是已經規劃整齊的井邑田，又稱為畛田。從根木道左至井邑開始樹封為界。由路線看，豎立在東、西、南邊

的大型道路及山崗上的界標，至少有八處。

在一大段記述履勘過程的銘文中，樹立界標的動作(圖四)，被隸定為今日我們使用的「奉」或「弄」字，並理解為「封」的意思，即《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中「封樹」的概念。現代漢字「奉」、「弄」和「封」的字形，讓我們很難與豎立界標的活動聯想在一起。但分見於《散盤》銘文前段的十八處「」字，卻以非常生動的形式，向我們展現了定界的動作。這個字的字形像是在告訴我們，在長途跋涉、確定地界的標記點後，他們以雙手捧著樹苗，極其慎重地將之植入泥土中。



圖四 散盤銘文代表豎立界標的字

地理的履勘結束後，在矢、散雙方見證下，由矢國的卑、驛、旅，以及參與定界的中央級官員鮮、且，代表矢國宣示：「我既然已將耕田的農具轉讓給散，若有違約，那就是我對散有不正当之心。若如此則將接受賠償的處罰。」接著，參與定界的武父、西工襄再宣讀另一段誓言：「我既然已將隰田和畛田轉讓給散，若有誤亂，就會接受賠償的處罰。」誓畢，便將矢割給散的田地畫成地圖，由矢王存放在豆邑新宮的東側殿堂。協議的約文分為左右兩卷，矢、散各擁一份，此次田地轉讓正式生效。

散氏宗親為紀念此事，可能是先請史官中農將這次校勘劃地的經過鉅細靡遺的寫成一篇三百五十字的長文，再將之仔細銘鑄在一件高二〇·六、口徑五四·六公分、重達二一·三公斤的厚重高圈足淺盤內。盤外飾以穩重明晰的長尾夔龍紋及獸面紋。(圖五)這種淺盤、廣面朝天的形式，似乎較其他器形更能突顯出銘文的顯著性。此外，與同時期的銅器銘文相比，通篇未提祖先的作法，似乎顯示

釋文：
用矢斃(撲)散邑，廼即散用田。履：自瀋涉曰(以)南，至于大沽，一奉(封)，曰(以)陟；二奉(封)，至于邊柳，復涉瀋，陟寧，叔(祖)畀馬隰。曰(以)西，奉(封)于敝戲、桂木，奉(封)于芻速，奉(封)于芻速，內陟芻，登于厂源(原)，奉(封)割耕、隰陵、剛耕，奉(封)于菓道，奉(封)于原道，奉(封)于周道，曰(以)東，奉(封)于野東疆(疆)右，還，奉(封)于履道，曰(以)南，奉(封)于儲速道，曰(以)西，至于唯莫(墓)，履井邑田，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奉(封)，道曰(以)東一奉(封)，還，曰(以)西一奉(封)，陟剛三奉(封)，降曰(以)南奉(封)于同道，陟州剛，登耕，降械，二奉(封)。矢人有隰履田：鮮、且、散、武父、西宮襄、豆人虞巧、象貞、師氏、右曹、小門人緜、原人虞丹、淮爾工(空)虎、孝肅、豐父、唯人有隰刑巧，凡十又五夫，正履矢舍散田，隰土(徒)毋西、爾馬菓肆、馱人爾工(空)駟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散父、效(教)栗父、襄(數)之有爾囊、州京(就)、倏異(露)，凡散有隰十夫，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矢卑、鮮、且、驛、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千罰千，傳棄之。鮮、且、驛、旅則誓，廼卑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隰)田、牆(畛)田，余又爽竊，爰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則誓。卑(厥)為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卑(厥)左執要，史正中農。



圖二 西周 散盤 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散盤 全形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為皇帝五十歲的生日獻禮。
〈散盤〉原器雖入藏宮中，但民間對其熱情不減。其銘文拓本成了珍稀之物。張廷濟指出當時「墨本在人間者日少，而覆鑄彷彿不止一本」，表示有許多仿本，甚至可能是偽器，

在市面上流通。在照相還未普及的時代，以透視手法製作的全形拓，更可使觀者在沒有見到實物的情況下，得以將銘文與器形相互參照觀看。（圖六）賞鑑家對拓片的喜愛不下於書畫收藏，除鈐上鑒藏印外（圖七），



圖七 清 散盤 拓本鈐印
《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在乾隆、嘉慶年間時興的考據學帶動下，研究、考證青銅器上的古文字成為清代學術界的時潮，也為辨別銅器銘文及內涵帶來了空前的學術成果。許多學者戮力對〈散盤〉銘文進行考證，其中尤以經學家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最具代表

得，可寶也。……」（圖八）
更於其上題跋。在一張著錄於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的拓片上，便有一段趨于密（一八四五～？）的題記：「吉金文字余最嗜者，毛公鼎、齊侯兩壘、散氏盤，以其可作周秦長篇文史誦讀，且原拓精本尤難得。舊拓惟清儀閣所藏密于阮氏為可信，其它則日夥矣。頃月川宗老以沈南蘋畫巨幅易得，可寶也。……」（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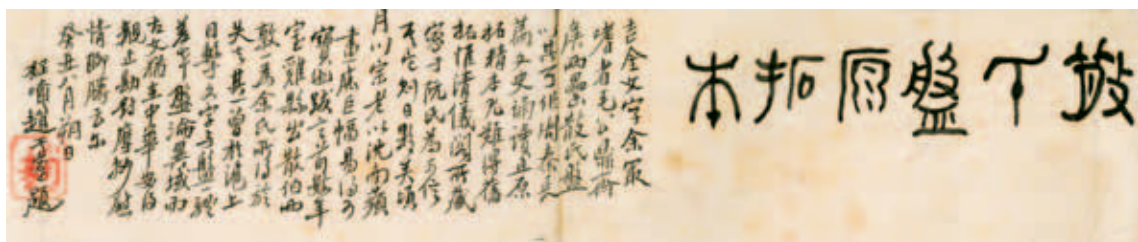
圖五 西周 散盤 器表紋飾

這件器物不是為某位祖先製作的祭器，而更像是做器者向在世宗親彰顯宗族大事、向後世子孫留下訊息吧！
康熙年間：一場漫長的文字校勘
西元前七七一年，周不敵來自西邊大戎的攻擊，生活在渭河流域的周王室以及許多貴族宗族紛紛向西逃亡，周的國都也就此遷到今日的洛陽。這一事件標誌了西周的滅亡及東周時期的開始。在準備逃亡之際，顯貴家族紛紛將家廟重器埋入地下，期望再回故地時，可以繼續使用。無奈這個願望就此沒有實現之日，矢、散豎立的界標隨著時間逐漸模糊，豆邑新宮的建築也頹傾無蹤。

二千餘年過去，清朝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的某一天，據說是在今日的陝西省鳳翔縣，埋藏在地下的〈散盤〉終於重見天日。對於繼承宋代以來金石學傳統的清朝文人學士來說，這件帶有長篇銘文的青銅器無疑是一件無價珍寶。
宋代所開啓的金石學傳統，基

本上關注儒家所認知的聖賢時代，即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生活的上古時代。上古青銅禮器，特別是帶有銘文者，便被認為是可親炙古聖先賢的媒介。由於古器分屬宮廷及私人收藏，幾乎無法遍覽，因而出現了如宋代呂大臨（一〇四四～一〇九一）《考古圖》及宋徽宗（一〇八二～一一三五）敕撰《宣和博古圖錄》一類的木刻板青銅器圖錄。另一方面，因青銅器及銘文具有認識上古時代第一手史料的價值，可通過「觀其器、誦其言」瞭解古代聖賢，故收藏、研究青銅器及銘文拓本，便成為另一種廣受士林喜愛的活動。這種觀念一直持續到了清代，銅器及銘文拓片仍是宮廷及文人雅士爭相收藏的對象。

據清代金石考據學家張廷濟（一七六八～一八四八）在《清儀閣題跋》中稱，〈散盤〉出土後經多次轉手，先為安徽歙州程氏所有，後被江蘇揚州的徐約齋重金購得，後又轉予洪氏。直至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由差使額勒布以鉅額收購，並於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貢入宮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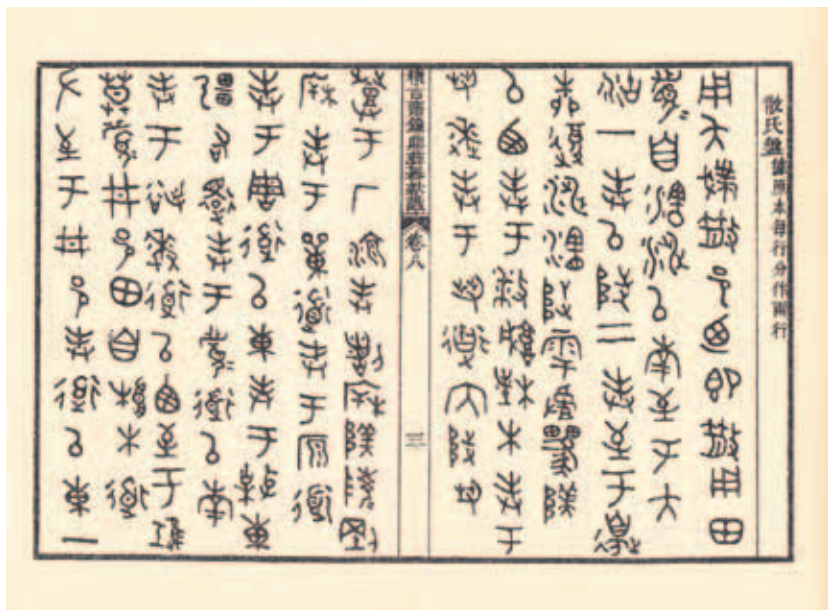


圖八 清 〈散氏盤原拓本〉題跋 《小校經閣金石文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定為「表」，並據古文獻中對「表」字的釋義，認為此字代表著井田中的分界。「涉」被釋為「洮」，隨位於其前的「澗」字一起被解釋為隴西臨洮一帶的河流名稱。但更為關鍵的是「矢」被釋為「大」，如此則全文之主題無法被解讀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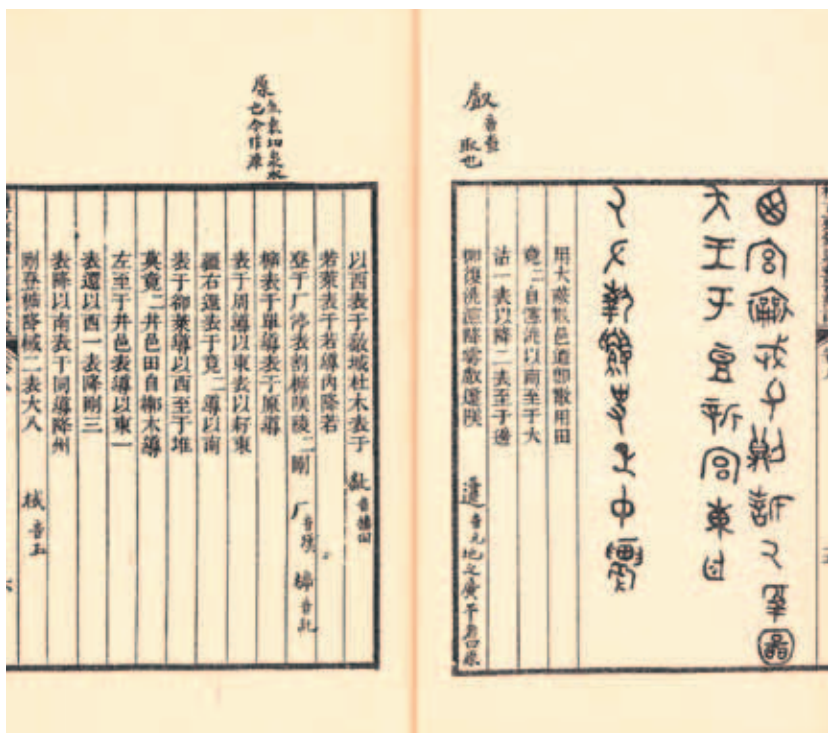
至遲於晚清，楊沂孫（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已將「矢」釋出，並知其為國名或地名。此外，他更釋出隰田，對認識銘文內容有重要意義。在吳大澂（一八三五～一九〇二）《憲齋集古錄》中，「涉」字已被正確解讀。劉體智在其《小校經閣金石文字》中，綜合前人之說，對阮元之解釋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書中對〈散盤〉銘文的隸定也與今日我們的認知較為接近。

自上一世紀二〇年代，現代考古學的出現將青銅器及文字研究又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大量具有準確出土地點的帶銘青銅器加速了青銅器研究的腳步。也因此，對〈散盤〉銘文的解釋也有所翻新。其中影響最巨的新認識是「散」字。阮元將這個字隸



圖九 清 阮元 〈散氏盤〉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性。在其所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散盤〉銘文被仔細的描摹出來。（圖九）其後附上了阮元對盤銘每一個字所做的隸定，部分並配上字音的解釋。（圖十）最後是他對盤銘內容的考證。他先考訂器物名稱，



圖十 阮元對散盤銘文所做的隸定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再根據典籍、禮書，如《左傳》、《國語》、《大戴禮記》等，考散氏之歷史沿革及銘文中之地理、田制。此外，更以其他當時所見銅器銘文、石鼓文與《說文解字》相對照，對個別人物及字辭提出看法。

上古時期的文字雖是我們今日使用的漢字的祖先，許多字體結構也與今日相去不遠，如〈散盤〉第一行的「用」、「田」及「南」等字。但盤銘中的一些關鍵字，卻相當難解。以代表樹封的「𠄎」字為例，阮元將之隸

定為「竟」，表示境界之意。後來的清代金文家則將之隸定為「眉」，釋義為田地的界墾。現代學者通過長時間的研究將之重新隸定為「履」，即考察、校勘之意。這一個在過去被視為名詞的字，便成了動詞，也就此讓我們對〈散盤〉銘文的理解生動了起來。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所提供之隸定，在內容上已與阮元所釋有很大的差別（圖二），體現了兩百年來所累積的學術成果，周人的步履逐漸由模糊而清晰。但這篇隸定及斷句並不是唯一版本，更不表示我們已經完全瞭

解其中的內容。〈散盤〉銘文的體例與一般西周銘文有所不同，可說是最難解銘文中的一篇。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出土，許多學者更進一步地思考與〈散盤〉銘文相關的歷史問題。例如，文末的史官史正中是誰的史官；矢、散不同的地方分級方式如何反映了西周時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銘文中的矢國應是古文獻所見的虞國，因此應該將「矢」讀為「虞」音。顯然，矢、散之間的故事未來還有待補充，甚至是重寫。探索〈散盤〉的路程仍未完待續……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參考文獻

1. (清)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〇。
2. (清) 張廷濟：《清儀閣題跋》，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九冊，臺北：新文豐，一九七九。
3. (清) 吳大澂：《憲齋集古錄》，臺北：臺灣國風，一九七六。
4. (清)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二。
5.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八。
6.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
7. 和國家》，北京：三聯書店，二〇一〇。
8. 陳昭容：〈談西周早期虞芮兩國位於汧河流域的可能性〉，論文發表於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與芝加哥大學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主辦之「近二十年新出土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〇。
9. 陳若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二〇〇五。